

9

永定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永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



〔上〕永定县政协大楼

〔下〕永定县政协《文史资料》第9辑编审工作会议留影



前排左起 余丽明 涂祥生 张弘昌 罗选才 胡有浪 范京增 陈炎荣 江 城
 后排左起 游晓悦 徐德芳 丁奕楼 苏启芬 李林发 吴初福 黄佛宝

〔廖景凡副主编请假〕



▲ 侨乡永定县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十年来，永定县采取多渠道集资办学取得显著成效，共集资3879.42万元投入教育，其中侨资达1200万元，现有中学36所，小学801所，其中侨助、侨建学校64座。

上图为今年落成的抚市中学教学大楼 （赖永生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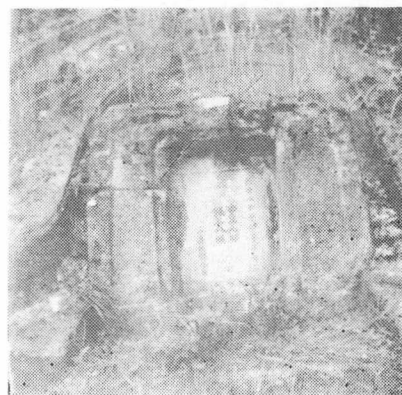
◀ 永定一中好校风、好学风带来好成绩。今年14岁的苏大新(左)和15岁的张广凡(右)分别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少年班。

（赖永生摄）



◀ 墓身一瞥

▼ 墓头和墓碑



李氏
始祖九公墓
始万郎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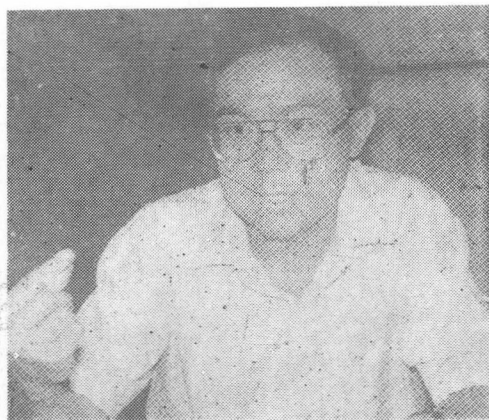
永定湖坑乡奥杏楼下村

(参看 《李登辉家族世系续志》)

墓头墓碑局部▶

[本页照片均由李林发提供]





〔左〕领导“独中复兴运动”时的胡万铎先生。

〔下〕深斋中学校园一角。马来西亚吡叻州深斋中学是胡万铎之父胡曰皆先生等于1957年创办的华文独立中学。曰皆逝世后，胡万铎继承父志，担任深斋中学校董会董事长，一贯大量资助和负责筹措该校的经常费用，并耗资150万元购买了7.5亩土地供该校扩建校舍。

请参看 右页夷轩所作介绍胡万铎的文章。



〔说明〕本页图片转载自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990年1月8日第12版。

原供稿人郑万成。

永定文史资料 第九辑

1990年11月出版

目 录

华 侨 资 料

胡万铎——著名马籍华人企业家，

更是复兴华文教育的英勇斗士…………… 夷 轩（1）

胡文虎兄弟在港、新兴建的“虎豹别墅”…………… 胡江平（15）

永定侨联优秀领导人游范吾…………… 曾少奇（17）

• 小资料 •

游宏蕴与侨光中学…………… 大 可（25）

新加坡永定会馆换届选举…………… 本刊资料室（35）

曾良材蝉联新加坡客属总会会长…………… 本刊资料室（57）

北马永定同乡会第25届会务主要负责人名单…………… 本刊资料室（78）

源 远 流 长

李登辉家族世系续志…………… 李林发 施 迁（21）

人 物 春 秋

爱国民主人士罗铁贤事略…………… 曾少奇（26）

王贯三来侨中之前及离侨中之后…………… 胡史樵（29）

记曾建平…………… 绍 箕（32）

古竹艺术奇才李友尧…………… 苏炯文 李锡良（34）

“麦子老”兴亡小史…………… 张 隽 黄 畴（36）

• 小资料 •

世界家禽学界新秀赖洲文…………… 王洛平（116）

旧 史 新 疏

- 两朝风雨与雷霆.....黄未因(45)
永定农村“一田二主”的封建土地制度.....范晓华(55)

工 商 农 事

- “采善堂万应茶”今昔.....涂 僧(58)
· 小资料 ·
古竹乡引种黑米成 工(114)

氏 族 杂 俎

- 永定熊姓源流和港泰印尼熊氏宗亲会社.....熊庆蛇(62)
凤城姓氏格局的变化.....廖德润(64)
永定氏族资料拾零.....林汉华(66)

文 化 文 物

- 回忆五十年代永定的群众文化生活.....陈炎荣(69)
高头复兴剧社始末.....蒋 宸(75)
永定传统歌谣概述.....江 城(79)
永定谚语的结构和艺术.....蓝 吉(99)
永定客话中的“俗语”.....涂祥生(106)
175年古尸及其随葬物.....赖森生 章 考(115)
· 编读往来 ·
“侨木”的木板胡以按(117)

故 乡 风 物

- 凤城八景寻踪.....范京增(118)
大溪忆旧.....〔台湾〕游岸平 巫钧连 本刊资料室摘编(131)

· 小资料 ·

探察仙湖洞.....本刊资料室(135)

文苑掇英

苏少眉诗抄.....连 曼辑(136)

计讯政协办公室(143)

本刊第8辑勘误表.....本刊编辑室(144)

本刊1—8辑总目.....黄 宝 整理(145)

插图(照片)

奥杏楼下李氏始祖万九郎公坟墓(3帧)李林发(提供)

领导“独中复兴运动”时的胡万铎先生

深斋中学校园一角.....转载《南洋商报》

封二(照片)

永定县政协大楼

永定县政协《文史资料》第9辑编审工作会议留影

封三(照片)

抚市中学教学大楼.....赖永生摄

永定一中学生苏大新、张广凡以优异成绩

考取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少年班.....赖永生摄

胡 ● 万 ● 铎

复兴华文教育的英勇斗士 著名马籍华人企业家 更是

夷
軒

前 言

胡万铎是马来西亚著名企业家。祖籍永定下洋中川村。为吡叻州马籍华人、大矿业家胡曰皆的长子。1935年2月28日诞生于吡叻积莪营。他虽出身于豪富家庭，但品性纯粹，毫无纨绔习气。自开始懂事的少年时期起，即具有锐意进取的蓬勃朝气和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而且襟怀磊落，智多识广，又刚强勇毅，遇事果决，因之一直是同龄人中超群出众的人物。他现在一身兼任许多大公司的主要领导，即除了担任以胡曰皆命名的马来亚和香港的多家公司的董事经理^①以外，还担任泛马加工木业有限公司、泛马木业有限公司、泛马胶业有限公司、积莪营锡矿有限公司、班台锡矿有限公司、复万泰信贷有限公司的董事经理。

经济事业如此兴旺发达，财力俨然雄视一方，胡万铎自然而然地相应享有不同一般的社会地位。然而胡万铎的名字在马来西亚甚至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中之所以被人广为传颂，并特别受到华人衷心崇敬，倒不是由于他的亿万财富，而是由于他捍卫华文教育的献身精神及其所取得的重大业绩。在华人心目中，首先他是热爱华文教育并为之奋斗不息的英勇战士，然后他才是企业家。正因为如此，胡万铎才从1974年起，即被吡叻华社人士选为华校董事联合会主席，一直蝉联至今，已历一十六年，而且还担任了其他许多社团要职，包括吡叻客属公会、永定同乡会主席，等等。三年前，他乘便回永定祭祖、探亲，对原乡文化教育及经济建设事业也给以高度的关注，人们至今还在称道不置。也正因为如此，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990年1月8日第十二版《大马闽人兴学办教史料集》专栏上，才以几近整版篇幅刊载了郑万成记者的《胡万铎与独中的新生》一文，相当详尽地介绍了胡

的事迹，称其为“独中复兴运动的先行者”。

本文主要就是根据郑文所记事实，并参考1981年10月出版的《吡叻永定同乡会会刊》，以及访问一些归侨所得的有关材料，综合编写而成。以下本文中凡加注“见郑文”的，即是引用南洋商报《胡万铎与独中的新生》的原文，敬希读者注意。

反对华教改制 少年崭露头角

胡万铎的幼年、少年时期，是处在马来亚风云变幻、忧患交加、战乱频仍、政局动荡的大混乱、大变革的时代。最初是英殖民政府的长期延续统治；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马来亚，又实施军事恐怖统治达三年八个月之久；1945年日本投降，英殖民者又卷土重来，马、华等族人民便奋起斗争，几经顽强拼搏，才取得了1948年2月1日建立“马来自治联合邦”的胜利；此后直至1957年8月31日，终于正式宣布建立马来西亚国家。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学校时办时停，极不正常，师生教学情绪自然也极不稳定。即使如此，对具有强烈进取心的胡万铎这个孩童来说，影响倒不十分大，只要学校能开门，他就能一心向学，而且成绩优异，只是年龄大了些。到1950年，他在吡叻断断续续完成了五年小学教育，便转往檳城钟灵中学就读，继续学完高小课程，并由此升入初中学习。到1955年，正当他升入高中一年级时，当地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学潮。就在此时，胡万铎以领导学潮的罪名而被当局逮捕了。

这次学潮是由马来自治联合邦政府颁布华文中学改制而引起的。马来西亚是个多民族的国家。马族人口最多，占了一半；其次为华族约占三分之一（按，现有约五百万人）；再次为印度、巴基斯坦等族人。自治邦政府为了加强实施马化，有意要逐步消灭华文，于是就颁令实行所谓华文中学改制，规定华文中学分两种类型，一为国民型中学，一为独立型中学（一般简称“独中”）。无论经费和课程设置，对这两类中学都有截然不同的规定。国民型中学，经费全由政府补足；语文课主要讲授巫、英文，以巫语为教学语

言：华文课不得超过三个教时。独立型中学，经费全由华人自筹；语文课讲授巫、英、中文，华语可以作为教学语言。这个显然歧视和排斥华文的所谓“改制”，如果实施，名义上虽说可以设立独立型中学，但在经济上政府全不负责，这样长期经费无着，势必难以为继。至于所谓国民型中学，虽然有三节华文课，实际上也形同虚设，徒有其名，因为学校为要保证巫、英文的教学质量，往往就把华文课挤掉。总之，这次“改制”就是基本上剥夺了华人子弟接受华文教育的权利，剥夺了华人接受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权利。所以这个命令一颁布，理所当然地立即引起华人社会的强烈反对，纷纷起来抗争。特别是檳城钟灵中学首当其冲，斗争最早在此爆发。正在钟灵中学高一读书的胡万铎，素极热爱自己民族的母语教育和传统文化，觉得自己在英殖民统治时期还有接受华文教育的自由，而华人经过长期英勇斗争，取得了民族自治权以后，反而没有权利接受华文教育，太过荒唐，难以容忍；而且民族文化的兴亡实质上是关系到种族绝续的大问题，绝对不能忽视。于是他就联络志同道合的学生干部一起合作，以确凿的事实，充足的理由，雄辩的口才，在广大同学中进行宣传鼓动，最后组织罢课、游行，从而掀起了波涛汹涌的学潮。当局惊骇万状，乃实行强力镇压。胡万铎就此被捕。与胡一同被捕的还有颜清文等共七位同学，人称“钟灵七君子”。^②这时，尽管胡万铎才十九岁，可是在领导学潮中却已充分展露了他的卓越见识、果敢精神和组织才干。尤其是他那颗热爱民族文化教育的赤子之心，与战友肝胆相照，甘苦共尝的昭然大义，更使人肃然起敬。因此胡万铎的名字一时传遍全马。

毕竟胡万铎是吡叻州大名鼎鼎的矿业家胡曰皆的爱子，在被扣查两个星期之后，经过头面人物、当地星报日报总经理胡榆芳等人的多方说项，檳城当局总算手下留情，从轻发落，没有判刑，只把胡万铎驱逐出境，不准再到檳城，并由钟灵中学开除其学籍了事。

万铎回到吡叻家中以后，曾向当地怡保华文学校——育才中学申请就读，育才校长原拟拒绝，好得胡曰皆的好友杨金殿，出于世交情谊，乃运用其育才校友会创办人资格的影响力，出面说情，万铎才得以进入育才。只过三个月，胡曰皆为防爱子再度卷入学运，重惹麻烦，便把万铎转学到怡保教

会所办的圣米高英文书院读中四班级。在英院读了八个月，胡曰皆索性把他送往国外。万铎迫于父命，只好与堂弟万红一道由马转往爱尔兰求学。从学习历程来说，万铎就此结束了华文学习的阶段。在爱尔兰先读了两年的先修班，1959年考进都柏林大学选修政治经济。时移势易，他早已心无旁骛，一心读书了。谁知事出意外，正当他潜心研读第二学年课程的时候，即1961年8月6日，其父胡曰皆在其住宅忽然碰上抢劫，中弹身亡。家遭大变，噩耗传来，胡万铎异常悲痛。身为长子，只得含悲忍痛飞回怡保治理父丧，并从此放弃学术上的深造机会，改行从商，继承父业。

据他自己事后回忆说，在学生的狂飙时代，他对父亲的生意毫无兴趣，然而在这个家庭巨变面前，一种责任感又逼得他不得不勉为共难，从头学起。凭着他的强烈事业心和有胆有识的特质，在此后一心从商的十二年中，竟成为“跨灶”庞儿，把父业发扬光大了起来，从早期集中于矿场及地产的事业，改为向多元化发展；直到今天已兼及经营汽车业、金融业、工业、木业、产业、胶业及种植业、而且每一行业都呈现一派繁荣、蒸蒸日上的气象。

1972年，胡万铎与陈桂萍结婚。1973年3月31日便诞生了第一个儿子胡铠林。事业有成，家庭有喜，他自然乐不可支。但是作为一个热爱自己民族文化的炎黄子孙来说，他断然不会只满足于个人的喜乐，而忘怀于民族教育事业的盛衰的。这时，改制后的华文教育恰又面临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因此，一股维护华文教育的炽热感情，又在胡万铎胸中象烈火一样燃烧起来了！他再也不能只在自己公司和自己家庭的小圈子里安坐下去了！

不顾个人得失 领导独中复兴运动

事情的经过及缘由是这样的。自1955年实施华校改制后，华人在“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传统思想指导下，为了使自己的子弟能继续接受民族母语教育，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都心甘情愿自己掏腰包，纷纷创办起了独立型中学。在吡叻州就先后办了九间独中。它们的校名是：深斋、培南、崇华、育才、华联、育青、南华、三民及培元中学。各县同乡会等华人社团

一面号召子弟进入独中学习，一面又特为独中学生每学期发放奖助学金。然而全靠民间独立投资办教育，毕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许多独中，每年校舍要修葺或扩建，仪器、图书要充实，要更新；教师工资、福利以及办公用费每月要源源支付，除了向学生收取学费外，只能向华社募捐。一年两年，大家凭着一股热情和勇气尚可支持，年长月久，天天陷于捉襟见肘的困境中，就会愈来愈感难以维持。募捐次数越来越频繁，而捐款数额却越来越少。同时向学生收费的标准也越来越高，使财力支绌的家长不胜负担，有的便忍痛把儿女送往国民型中学。这样，独中由于经济危机又引发了生源危机。到1969年，“五·一三”种族暴动事件发生，华文教育成为敏感问题，形势更加恶化。受到这种严峻的政治气氛的影响，生意人不仅不敢出来做独中的董事，甚至也不敢向独中捐款。很多有钱人即使偷偷捐了钱，也不敢写上自己的名字，只署个“无名氏”。在上述经济、政治、生源诸种因素长期冲击下，进入1973年，独中已临到了生死关头。要么，关门停办；要么，背水一战，冒险向社会筹募基金，充实独中经济基础。是年4月1日，吡叻九间独中的董事联合会和教师联合会^③举行联席会议。胡万铎当日以深斋独中董事长的身份出席。会上，素极热心华文教育的沈亨详细分析了独中存亡已迫在眉睫的严重形势，建议不管成败利钝立即行动，为九间独中开展筹募百万基金运动，以打开新的局面，争取生存条件。这个意见，当席获得一致通过。随即成立筹募小组负责劝募，并推举胡万铎为筹备主任。

这时，筹备小组虽然名义上成立了，但还不具备合法性，还不能开展工作。同年4月15日，董、教联又在吡叻中华总商会召开联席会议。当时董联会主席张国林在会上宣布，接纳九间独中来函所提筹款建议，并成立以胡万铎为首的筹备机构，定名为“吡叻华教董、教联合会协助独立中学发展小组筹备委员会。”可是事后考虑到，如此安排实有不妥。因为这个筹委会既属董联，又属教联，分属于两个不同组织，就等于新成立的机构，如不向政府注册，则是违法的；如依法提出注册申请，又旷日持久，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批准，取得合法地位。大家认为，当前独中已经奄奄一息，这个小组筹备会最好要从速在董联和教联中认定依附一家，才可避免申请注册，争到时间来开

展募捐，以应火急。这样经过多次协商，最后一致同意按照筹款事项是归董联负责这个老规矩，决定把这个发展小组归属到董联会去，简称为“吡叻独中工委”。不过，名义上它虽是董联会的附属机构，而实际上却一切工作都由工委自行决定，董联从不过问和干预。于是以胡万铎为首的这个工委就开始进行具体计划，分头活动，公开打着董联会的合法大旗，向华人社会普遍展开宣传募捐运动。独中新生的希望之光就这样在华人眼前亮起来了。当然，在朝在野都有不少人受到震惊，各人怀着各不相同的心情静观以待。

起初，有的人对胡万铎能否同意出任工委主任还持怀疑态度。因为要担任这个职务，对胡来说就要准备付出不小的代价甚至某种牺牲。第一、当时“做独中董事都被人形容为带有挑战性的职位”，（见郑文）何况现在要带头出来为支持独中而大事筹募，其社会影响更为深广，显然要冒政治风险。第二、要向人募款，必须自己率先解囊，而且数额要大，才能起到风行草偃的良好作用，这就意味着要准备付出相当的经济代价。第三，胡的个人经济事业正在蒸蒸日上，这是他十二年来苦心经营、日夜操劳的结果。现在要他从公司抽出身来积极投向社会工作，必然要占用其公司的大量时间，这对其个人事业也是一种损失，甚至还可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其实，人们所担心的这些问题，胡万铎都想到过了，但他并不在意，他顾虑的只是久未参与社会活动，“连在公开场合出来演讲都会感到怯场”，“今番重作冯妇，负此重担，实在没有什么信心”。（见郑文）那么，最后他又为什么会挺身而出，慷慨就任而毫不踌躇呢？根据他自己的回答是：“1969年五·一三种族暴动事件，使我心里产生不满，学生时代的那种热情复炽，认为这次是为华社工作的适当时候，所以就毫不犹豫地接下这副担子”。（见郑文）其热爱民族文化的激情和决心，以及不顾个人安危得失的无畏气概，真使人听了为之感奋不已。

独中复兴运动的成功与胡氏的特殊贡献

独中工委，自1973年正式开始筹募百万基金以后，在胡万铎精心领导

下，配合陈孟利、王挺生、沈亭和一批热爱华教工作者的一致努力，不辞劳苦，四处奔波，一面广泛宣传动员，一面深入重点对象进行劝募，立即得到华人社会的热烈响应。这就使得胡等工作热情更加高涨，信心和决心也就更加坚定。从此独中复兴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原来观望的人也动起来了，义款源源涌至，仅历几个月，捐款目标便超额完成，已达一百余万元。这个筹募运动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第一、它为独中今后有计划的发展打下了物资基础。百万基金立即解除了几家独中无米下锅、危在旦夕的威胁，这是不用说的了，更重要的是它为独中开辟了未来，展示了华文教育的美好前景。基金筹足以后，按计划储存生息。今后九间独中要更新设备、支应经常费用等等，由于有了可靠的充实的经济来源，就完全可以预订计划，未雨绸缪，按部就班，开展工作，使华校设施日益完善起来；再不必象过去那样，年年沿门托钵，临急求援，往往顾此失彼，度日为难，这就为华文教育有计划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证。此外，这种经济形势的根本好转，在精神上给以独中师生的鼓舞也是很大的，它将提高全体华人办好独中的信心，并进一步大力支持华教。

第二，它锻炼出了一批精英分子，为华社训练和储备了人才。由于这次筹募运动是在当时“万马齐喑”的环境气氛中开展起来的，牵涉面广而又深，绝不同于一般的慈善募捐，而是具有特殊的某种战斗性质。加以任务繁重，工作复杂。经历这次运动的磨炼，等于投入一座熔炉去锻铸，可以开拓眼界，提高胆识，增长才干。结果，真的成功地制造出了一批精明练达、出类拔萃的从事社会工作的干才。1974年，吡叻董联会换班，胡万铎为首的独中工委的中坚人物即接过了领导班子，无形中为董联会挹注了一股强大的活力，使该会工作更加虎虎有生气。因此，人们对新换的董联会的领导班子曾给以很高的评价：“自独中复兴后，独中董事会的领导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致使今天的独中步上稳健发展阶段，且获得令人激赏的成就。”（见郑文）可见这次独中运动的成功之处，并不是仅限于百万基金。

第三、它有力地带动了全马独中复兴运动和捍卫母语教育的热潮。九间独中在1973年以前的摇摇欲坠的处境，并不是吡叻州独有的现象，而在全马

带有普遍性。吡叻九间独中百万发展基金的筹募成功，大大提高了其他州的华人捍卫母语教育的热情和信心，因而他们也纷起仿效，开展大规模募捐工作，从而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马独中的复兴运动，而且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比如光是新山一地，为宽柔独中筹募基金，只一个月工夫就募到一百万元。

工委会这次的筹募运动，其成就如此之大，其影响又如此之深广，所以事后人们就把它称之为独中复兴运动。

那么，这次吡叻独中复兴运动为什么会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功呢？原因有多种。

（一）得人和 上面说过，华人一般都有热爱自己民族、热爱祖国语言的传统观念，目睹九间独中的艰难境况，大都早已心急如焚。而今有忠义之士出来倡导筹款，重振华文教育，自然喜出望外，群起响应，你一百，我一千，集腋成裘，于是就超额完成了任务。这正如胡万铎所说：“由于这一运动迎合了华社华教的愿望，对正了华社对华教的要求。”（见郑文）对于这点，马来当局也已经明确意识到了。1974年，马来西亚全国教育总监姆勒克在一次召见董、教总代表团和一批华校人士对话时，即曾这样说过：“你们在短期间内即筹到一百万元，这些钱若来自一个富翁或财团，我们并不奇怪，但是这些钱却是民间一点一滴的捐输，我们便不得不关注了。”（见郑文）可知人心所向，事必有成。

（二）得天时 九间独中的筹募工作，不早不迟，选在1973年开始，这对华社或对马来当局来说，都可谓选准了最佳的时机。如果太迟了，有的华校关门了，那要重办复苏，当然工作更形艰巨，甚至不免事倍功半。如果太早了，比如在1970或1971年进行，那各种条件还不够成熟，不仅成功漫无把握，甚至还可能出现性质严重的后果。因为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有关种族关系已成为最敏感的问题，“许多课题都被列为言论禁区，人们缺乏发表意见、批评与抒发不满的管道”。（见郑文）年复一年，意见越积越多，到1973年，好象洪水上涨到了就要冲破堤坝的时候了。“适逢吡叻发动一项挽救独中的筹款活动，并提出‘发展华文独中，捍卫母语教育’的诉求，很快

就激发了华裔维护本身权利的共鸣。因此许多积淀的复杂感受，象山洪爆发一般倾泻而出，虽然它采取的是曲折的表达方式。”（见郑文）由此可知，如果说“得人和”，是指出于民族感情的话，那“得天时”指的便是1973年华社各阶层要求设法冲决几年来种种言论限制，表达自己愿望最强烈最迫切的时机，因而也就是最佳的时机。这是对华社而言。至于对马来当局来说，如果“五·一三事件”刚过去不久，独中就进行筹款，那显然与当时的偏激政策抵触，后果不妙。但是到了1973年，当局经过了三四年的反思，该已冷静认识到，如果偏激政策长期坚持下去，显然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损于全马的长远利益，倒不如适可而止，执行和解政策，更为适宜，于是对独中募款，就采取了不予追究的态度。前举姆勒克说的话，就从侧面暗暗透出了一点这个讯息。他说，百万基金出于“民间一点一滴的捐输，我们便不得不关注了”。这句话的潜台词说白一点，就是如果强力干预此事，就可能会犯众怒。谁都知道，“众怒”是不能“犯”的。所以说，1973年是最佳时机。

有人说，胡万铎非常精明，他毅然担任工委主任，认为“这次是为华社工作的适当时候”，所谓“适当”，原来就是经过如上的形势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三）领导得力 “得人和”，“得天时”，都是客观条件，“领导得力”则是主观因素。客观条件固然重要，但主观因素毕竟才是对成败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所在。独中工委的成员都是精选过的能人，如沈亭、陈孟利、王挺生等人，一个个都是有胆识、有作为的人才；其中最主要的当然还是身为主要领导的胡万铎。正如事后人们所评论的：“从以后形势发展来估计，那时任何人出来领导都肯定会有好成绩，但不可能达到胡万铎的效果。”（见郑文）“所有认识胡万铎和跟胡一起工作的华教人士也一致认为”主任一职，非胡莫属；在这个“人选方面”，胡万铎外，大家“不作第二人想”。（见郑文）这是因为筹款领导人必须具备“家境富裕”、“有民族感情”和“年轻有为”这三个条件，而胡万铎恰好全面具备。（见郑文）对此，人们是这样具体评估胡万铎的：

胡“家境富裕”，拥有亿万资财。一个财力雄厚的人，社会信誉好，号